

发展、特征与讨论:美国中东研究的百年历程^{*}

王 晋

[内容摘要]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的中东研究阵营已经成为西方中东研究的中心。在其发展历程中,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得到了美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形成了以高校科研单位为主体,资助来源多元,专业学会和期刊为平台,不同观点和视角相互争鸣的研究体系。美国中东学界逐渐探索出与学科理论的合作关系,致力于实现区域研究与学科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总结美国中东研究的发展经验和不足,能够帮助我们构建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区域国别学”学科。

[关键词] 美国中东研究 美国中东政策 国别和区域研究

[作者简介] 王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区域研究是以不同国家和国家聚集而成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广泛研究对象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面貌的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全世界的关系加强,但对亚洲和非洲的了解十分有限。美国因此出台各种资助项目,指导和鼓励学者们开展对其他区域和国家的研究,学科涉及地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美国区域研究最早由私人团体发起,政府机构在其发展壮大后,逐渐介入并提供资助;最终形成了由私人基金会、政府机构、学术精英组成的研究网络,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相互关系。时至今日,美国已成为西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中心。

作为美国区域研究的一部分,中东研究为美国战略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1JZD064)的阶段性成果。

1911年美国“肯尼迪神学院”聘任美国闪米特语言学家邓肯·巴拉克·麦克唐纳担任“伊斯兰教先知研究系”主任,开启了美国学术界中东研究的序幕。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中东研究已成为其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也是西方中东研究的“领头羊”。

而在美国外交实务中,中东专家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拜登政府邀请了纽约福特汉姆大学的中东问题专家阿莎·卡斯特贝里·赫尔南德兹担任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局的高级顾问。马里兰大学政府与政治学系教授希布利·特拉哈米、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马克·林奇教授等学者,也在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国内对于美国中东研究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①梳理美国中东研究的发展历史,分析美国中东研究的体系特征有助于了解美国中东战略的决策依据和关键机制。本文旨在梳理美国中东研究的历程与特征,分析美国以中东研究为代表的国别区域研究与美国学科体系的关系,并探讨它们对中国国别区域研究的启示。

一、美国中东研究的机构变迁

美国的中东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基督教士们在中东的传教活动。“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是整个西方海外扩张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②这一时期,美国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逐渐成为美国三大新教宗派,福音传教运动、摩门教、“千禧年主义”和一些黑人教会在传播宗教使命的驱动下,纷纷向中东地区派遣传教士。1819年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派遣传教士列维·帕森斯和普林尼·菲斯克前往中东,调查当时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黎凡特地区宗教情况。至19世纪末,美国已经在黎凡特、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潘光、余建华:《战后美国的当代伊斯兰中东研究(上)(下)》,《阿拉伯世界研究》,1990年第3、4期;姚慧娜:《利益集团与美国的中东研究》,《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5~134页。

^② 唐逸:《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等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布道会所,拥有数万信徒。^①

20世纪起,随着美国经济势力在全球拓展,美国高校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度上升。1927年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东方语言和文学系,聘请了来自贝鲁特美国大学的黎巴嫩历史学家菲利普·西提任教,开设阿拉伯语和中东历史课程。普林斯顿大学也因此成为全美最早开设中东语言和历史课程的高等院校。在西提教授的力推下,普林斯顿大学在20世纪40年代开设了多门中东语言、文学和历史课程。这一时期,美国逐渐培养了一批中东研究专家,但是相较于欧洲,美国的中东研究仍然较为薄弱。^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欧洲的著名中东研究专家前往美国高校工作。英国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东方学家汉密尔顿·亚历山大·罗斯金·基布爵士^③前往哈佛大学任教;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方语学院的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埃德蒙·冯·格鲁内鲍姆^④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近东研究中心主任;柏林大学中东历史和语言学专家弗兰茨·罗森塔尔^⑤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苏联学者奥梅尔扬·约西波维奇·普里察克^⑥任教于哈佛大学,并设立了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开展对东欧和巴尔干地区蒙古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德国学者沃尔特·布鲁诺·亨宁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波斯语研究项

① Mehmet Ali Dogan,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Middle East: Foundational Encounter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1, p. 79.

②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美国本土中东研究专家开始崭露头角,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伊朗和中亚史专家理查德·弗莱,其著作《布哈拉:中世纪的辉煌》最为学术界所知。参见 Richard N. Frye, *Bukhara: The Medieval Achievement*,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5。

③ 汉密尔顿·亚历山大·罗斯金·基布爵士翻译了多部重要的阿拉伯文学著作,参见 Sir Hamilton Alexander Rosskeen Gibb, eds.,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 ~ 1354*, London: Routledge, 1929。

④ 古斯塔夫·埃德蒙·冯·格鲁内鲍姆是美国奥地利裔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近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关注阿拉伯尤其是北非国家的诗歌与文学,参见 Gustave Edmund von Grunebaum, *Classical Islam: A History, 600 A. D. to 1258 A. 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⑤ 弗兰茨·罗森塔尔是美国耶鲁大学伊斯兰学、语言学教授。早年研究阿拉姆语,后因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而辗转至美国,先后任教于辛辛那提希伯来联合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其著作《穆斯林史学史》是国内研究中东史学史的重要外文参考。参见 Franz Rosenthal, *A History of Muslim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Brill, 1968。

⑥ 奥梅尔扬·约西波维奇·普里察克早年从事蒙古语言、阿尔泰语言、内亚历史、东斯拉夫语言的研究,后建立“乌拉尔-阿尔泰学国际协会”,20世纪60年代移居美国。

目。^①

随着一批欧洲中东研究学者来到美国,美国顶尖高校纷纷建立中东研究机构。1954年哈佛大学成立中东研究中心,^②1954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中东研究所。195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中东研究中心,首任中心主任是美国著名犹太研究专家以法莲·斯宾塞。同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近东研究中心,1961年密歇根大学成立中东和北非研究中心,196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中东研究中心,1965年芝加哥大学成立中东研究中心。

1946年华盛顿中东问题研究所建立,并于1947年起发行《中东学刊》,致力于分析“区域国家内外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不同国家的政治认同、争取经济自主的动力、文化条件、人口压力以及区域意识等”。^③《中东学刊》至今仍是国际中東研究学界的顶级期刊。1952年,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召开了名为“近东:社会多样性与文化背景”的学术会议,这也是全美第一届关于中东地区的学术会议。

1966年,美国中东研究协会宣告成立。美国中东研究协会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下设的中东研究机构,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中东研究协会具有较强的学科融合特点,主张通过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开展对于中东地区的研究。该协会从1970年开始出版学术季刊《国际中東研究学刊》,每年发布北美中東研究协会会员名录。协会的第一任主席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莫洛伊·伯格兼任。

此后,随着一批美国高校培养的中东学者走上高校教职,一批新的中東研究机构在美国高校建立。1973年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神学院成立了美国第一家伊斯兰教研究机构,以美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东方问题专家邓肯·巴拉克·麦

① 亨宁是德裔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毕业于哥廷根大学,主要从事伊朗一带历史语言如粟特语、巴克特里亚语、花刺子模语、埃兰语等的研究,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古代伊朗语言专家。

② 2005年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出资帮助哈佛大学中東研究中心重新开设了硕士和博士研究项目。

③ Timothy Mitchell,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cial Science,”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25.

克唐纳命名。^① 1975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建立中东研究中心。1978年哈佛大学成立犹太研究中心。1980年布兰戴斯大学成立科恩当代犹太研究中心。198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维拉诺瓦大学成立了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这一时期,受到宗教团体和欧洲东方学传统的影响,美国的中东研究在方法上仍然以历史学、语言学和宗教学为主,研究内容也主要是中东地区的历史、宗教和文化。

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中东研究界同政策界的互动逐渐增强。1981年美国中东政策委员会成立。该机构定位为促进美国国会同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非官方机构”。“中东政策委员会”每年都会召开多场学术会议和美国—阿拉伯国家关系对话,邀请美国和中东国家的外交官和政治高层与会,讨论重大政治议题。该委员会还定期出版学术期刊《中东政策》,关注中东地缘政治与大国中东政策,是讨论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学术平台。中东政策委员会的历任主席都是美国政界和外交界重要人士,现任主席是曾经担任美国驻阿曼大使的理查德·施密尔。

冷战结束后,美国又挂牌成立了多家中东研究机构。1992年,美利坚大学成立了全美伊斯兰事务研究所,丹佛大学成立了伊斯兰—犹太研究所。1993年乔治敦大学成立了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王子穆斯林—基督徒沟通中心。^② 2000年阿肯色大学成立了法赫德国王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③西北大学成立了非洲伊斯兰思想研究院。

而在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深感到亟需加强对中东国家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了解。“美国的伊斯兰研究,既源于公众对伊斯兰极端分子暴力活动的关注,也是源于对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群体的无知与偏见。”^④因此从2002年开始,美国教育部大幅增加了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项目的资助额度,“资助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或者前往其他国家学习”,加强对其他国家和地

① 即邓肯·巴拉克·麦克唐纳研究中心(Dukan Black MacDonald Center)。

② 该中心以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命名。

③ 该中心以沙特阿拉伯前国王法赫德命名。

④ Charles Kurzman, “Islamic Studies and the Trajectory of Political Isla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36, No. 6, 2007, pp. 519 ~ 520.

区的研究。^① 中东地区一直是“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项目支持的重点区域之一，在 2021 年的项目清单中，涉及中东地区的资助额度达到“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项目资助总额的 11.5%，仅次于东亚地区的 17.7% 和拉美地区的 16.8%。^②

这一时期，又一批美国高校设立了中东研究机构。2002 年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成立了犹太、大屠杀与和平研究中心，2003 年北卡罗莱纳大学成立了卡罗莱纳中东和穆斯林文化研究中心，2005 年美国海军学院成立了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2005 年波士顿大学建立了埃利·威塞尔犹太研究中心，^③2006 年杜克大学成立了杜克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2007 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成立了中东研究所，2009 年乔治·梅森大学成立了阿里·尤瓦尔·阿克全球伊斯兰研究中心，2009 年斯坦福大学建立了阿巴斯伊斯兰研究中心，2011 年佛罗里达大学建立了全球伊斯兰研究中心。

除了大学系统以外，美国还建立了众多中东研究智库。2006 年，卡耐基基金会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成立了马尔科姆·科尔·卡耐基中东研究中心。2007 年成立的战争研究所专注分析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安全局势，并建立了伊拉克项目、阿富汗项目和叙利亚项目等研究团队。2010 年，兰德公司成立了兰德中东政策研究中心，定期出版关于中东局势和大国关系的报告。2008 年布鲁金斯学会建立了布鲁金斯多哈中心，并在 2021 年宣布更名为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特别关注美国中东政策与中东热点议题。2017 年中东政策解放研究所在华盛顿成立，专注于中东重大政治议题。

此外，冷战结束后，美国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由相关领域学者群体和社会团体建立的中东研究机构，其中后者往往兼有美国中东政策游说集团性质。1994 年美国犹太学者丹尼尔·派普斯创立了美国中东研究论坛，旨在维护美国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该机构出版的学术期刊《中东研究季刊》除了关注中东地区重大

① 1970 年后，“国防外国语言奖学金”更名为“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参见 David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155。

②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Fellowship Program,” <https://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pe/iegps/flaspresskit.pdf>.

③ 该中心以美国著名编剧和演员、1986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威塞尔命名。

现实事件外,也关注中东的重要历史问题,已逐渐成为国际中东研究的最具影响的期刊之一。^① 同样,1984年建立的“全美马格里布地区研究所、1985年建立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1993年建立的美国人与以色列人合作计划、2002年建立的全美伊朗人委员会等机构,都在美国中东研究中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一些行业交流的机构如2008年9月在匹兹堡成立的美国中东研究所,也成为了拓展美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该机构专注于美国和中东国家之间的卫生、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理事会成员大多来自于美国的医疗行业以及中东国家的卫生行政系统。

近年来,美国中东研究机构与中东地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也日益密切。在美国,乔治敦大学2005年与卡塔尔合作建立了国际和地区研究中心,出版学术著作,召开学术会议,关注中东地区的重大政治事件。马里兰大学政府与政治学系希布利·特拉哈米教授主持的重大事件舆情问卷项目长期与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和以色列的高校合作,调查和分析中东民众对相关事件的观点与看法。^② 在中东,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阿拉伯和中东研究中心、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的伊斯兰研究院、以色列的摩西·达扬中东与非洲研究中心和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等也同美国高校和智库展开了密切合作。

二、美国中东研究体系的演变

美国中东研究体系,由研究资助方和研究人员两部分构成。经历了百年的变化,在研究经费保障上形成了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外国政府捐助等多元化的研究保障机制。在研究人员上,阿拉伯裔研究人员逐渐成为美国中东研究的重要力量;而美国中东研究者内部,也出现了犹太学者群体和阿拉伯学者群体的激烈论争。

① “About the Middle East Forum,” <https://www.meforum.org/about/>.

② 参见项目网站 <https://criticalissues.umd.edu/>。

（一）美国中东研究资助来源多元化

美国早期的中东研究受到美国资本力量推动。为了了解中东石油出产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资助美国专家赴中东考察访问。1919 年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塔德教授就是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建立了东方研究院,搜集和整理中东地区的考古资料。1927 年普林斯顿大学成立的东方语言和文学系,也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资助下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帮助。1946 年建立的华盛顿中东研究所,以及 1947 年开始出版的《中东学刊》,都受到了该协会下设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委员会的资助,而洛克菲勒基金与福特基金则是该协会的重要资助方。^①

早在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推出了陆军特别训练项目和民政事务培训学校项目,在全美培养亚洲和欧洲事务的人才。同时,美国情报机构和军事机构为了加强对中东地区和国家的了解,构建围堵苏联的网络,还秘密出资支持美国的学者前往中东开展学术研究和实地调研工作。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为了与苏联争夺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出台资助计划,鼓励包括中东研究在内的国别区域研究。国会 1958 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案》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外语教育和国别区域研究的发展。该法案第六章要求在大学里建立外语和区域研究机构以满足美国国家安全需求。以此为框架和动力,美国逐渐形成了外语教学、区域研究、海外学习和海外访学的资助网络。“《国防教育法案》预示着美国承诺将新的注意力投入到其国界之外的世界上——首先教授更多种类的外国语言,然后再深入了解主要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②

1961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相互交流与文化教育法案》^③,进一步强调了在美国

① Andrea Teti, “Bridging the Gap: IR, Middle East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ary Politics of the Area Studies Controvers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1, 2007, p. 123.

② Ralph Hines, “An Overview of Title VI,” in Patrick O’Meara and Howard D. Mehlinger, ed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

③ 该法案也称为“富布赖特—海耶斯法案”。

国内推行外语教学和区域研究的必要性,并有针对性地为美国的研究者赴海外开展研究、撰写文章、开展教学等项目提供资助。该法案资助掌握语言和专业基础知识美国的教师和学生前往他国游历和学习,增强了美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水平。法案还专门推出海外集团项目,授权美国政府在海外建立研究中心,鼓励美国学者前往海外研究机构开展语言能力培训和区域国别研究。

1980年开始,美国社会对区域研究的需求增加。1980年,《国防教育法案》的第六章被纳入《美国高等教育法案》,提出区域研究和外语教学不仅应满足美国政府的政治需求,还应探索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潜力,服务于美国企业在海外开拓市场的战略。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美国教育部向高校提供了外国期刊计划和暑期语言学校计划等项目,鼓励美国的外语教学和区域研究发展。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东研究面临资金挑战。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在1994年解散了运行了近40年的区域研究联合委员会,终止了对重大区域研究项目的资助。这一时期,美国针对区域研究的拨款和资助持续减少,资助方更关注主题鲜明、同后冷战时代相关的跨学科研究项目。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国会再次大幅增加了对外国语言教学和区域研究的资助力度。“2001年后,尽管美国社会对于‘伊斯兰’‘穆斯林’的关注度持续升高……但是美国高校的中东研究仍然是‘矿井中的金丝雀’。”^①随着中东研究机构数量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资助项目再次显得捉襟见肘。

在研究议题上,美国政府的研究拨款更愿意给予同重大现实议题相关的研究项目,如“恐怖主义”“国家安全”等;对于语言、文化、社会、宗教等研究议题则兴趣减退。“美国的政客们也许知道美国在与某一个模糊的中东敌手激烈竞争,但是这些‘冷战斗士’们更希望听取国防部及其下设智库的意见和观点,并将有限的研究经费划拨给这些机构。”^②

① Seteney Shami and Marcial Godoy-Anatvia, “Area Studies and the Decade after 9/11,” in Seteney Shami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eds., *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frastructure of Knowled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53.

② Kevan Harris, “Book Review: 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frastructure of Knowledge,”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47, No. 3, 2018, p. 361.

在此情况下,美国中东研究机构开始主动寻找新的资助途径。中东国家的财团、基金和政治机构,成为了重要的资助来源。比如乔治敦大学的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王子穆斯林—基督徒沟通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所、加州伯克利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北卡罗莱纳大学卡罗莱纳中东和穆斯林文化研究中心和杜克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等机构,都受到了来自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资助。^① 还有一些如纽约大学中东研究项目,则积极拓展同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在中东地区开设办公室,同合作高校开展联合研究活动。

(二) 美国中东研究学界的内部纷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东研究者的族裔背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美国早期中东研究学者中,很多是犹太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裔学者进入了美国中东研究队伍。这“使得美国的中东研究协会从一个对中东感兴趣的组织,转变为了一个凑巧在美国齐聚的中东组织。”^② 学者不同的族裔背景,往往影响学术立场,进而还会加剧美国中东学界内部的立场对立。根据美国中东学者的立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亲以色列”和“亲阿拉伯”/“亲伊斯兰”两大阵营。1987年美国学者保罗·芬德利出版了著作《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指出美国的中东政策受到了来自于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政治和社会团体,尤其是美国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③ 2005年美国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出版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也强调了美国犹太群体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④

与之相对,犹太裔学者则认为美国中东政策受到了阿拉伯“游说集团”的干扰。2005年美国学者贾尼斯·特里出版了《美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游说集团的

① 关于沙特阿拉伯对美国中东研究机构的资助,参见 Raymond Ibrahim, “Hidden Saudi and Qatari Funding Distorts Middle East Studies,” Middle East Forum,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meforum.org/61807/foreign-funds-subvert-american-universities>。

② Norvell B. De Atkine and Daniel Pip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What Went Wrong?” Middle East Forum, <https://www.meforum.org/3899/middle-eastern-studies-what-went-wrong>。

③ [美] 保罗·芬德利著,武秉仁译:《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④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著,王传兴译:《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用和特殊利益群体》一书,展示了不同国家游说集团在美国中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特里在书中将美国的阿拉伯裔学者定性为阿拉伯世界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① 伊利诺伊州长州立大学比较政治学副教授哈利勒·马拉尔在其2009年出版的《阿拉伯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美国中东政策受到了“以色列游说集团”和“阿拉伯游说集团”的影响,近些年来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显著增强。^② 2010年美国以色列合作计划执行主任迈克尔·巴德出版《阿拉伯游说集团:损害美国中东利益的隐形联盟》,认为阿拉伯国家在美国国内形成了两个游说团体,一个游说团体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雇佣的美国公关公司,旨在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另一个游说团体则是在美国高校和学术界的阿拉伯裔学者,旨在影响美国公众对中东的认知。巴德认为,两个阵营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削弱美国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③

学术立场的差异,甚至上升为学者间公开的人身攻击。美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乔治敦大学宗教和国际事务方向以及伊斯兰研究方向教授约翰·埃斯波西托^④就和中东论坛创始人、美国犹太裔学者丹尼尔·派普斯多次在网上“开炮”。派普斯将埃斯波西托形容为“‘瓦哈比’的游说者”,而埃斯波西托则将派普斯形容为中东学界的“黑暗领主”。^⑤ 即使是国际中东研究泰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路易斯,也被批评为“反伊斯兰”“反阿拉伯”学者。^⑥

一些社会团体也试图左右美国中东研究的立场和观点。比如在讲授伊斯

① Janice Terry,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Role of Lobbies and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② Khalil Marrar, *The Arab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③ Mitchell Bard, *The Arab Lobby: The Invisible Alliance that Undermines America'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arper, 2010.

④ 美国著名中东学者,其著作《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正想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最为中国读者熟知。

⑤ Robert Spencer, "John Esposito: Bernard Lewis, Daniel Pipes 'Among the Darth Vaders of the World'," *Middle East Forum*, February 15, 2008, <https://www.meforum.org/campus-watch/12535/john-esposito-bernard-lewis-daniel-pipes-among>.

⑥ Michael Hirsh, "Bernard Lewis Revisited," *Washington Monthly*, January 8, 2014, 关于美国学者对伯纳德·路易斯的评价,参见 Ihab Shalbak, "The Roots of Bernard Lewis' Rage,"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21, Issue 4, 2018, pp. 505 ~ 511; Laina Farhat-Holzman, "Bernard Lewis: The End of Modern History in Middle East,"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Vol. 72, No. 72, 2015, pp. 154 ~ 159.

兰、中东、阿拉伯等课程内容时候,往往会引发不同族群学生之间的激烈论争。争取平等机遇中心^①会鼓励学生们向任课教师施压,反对教师丑化穆斯林群体;而以校园守望者^②为代表的学生团体,则反对任课教师“美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将一些“极端主义同情者”挂在官网上公开批判。“社会团体对高校课堂的干扰……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偷偷录制视频和音频,上传课程内容等方式,让任课教师感到了较大的压力。”^③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东研究人员背景的多样化,必然影响研究预设和研究结论,也很容易引发学者之间有关彼此宗教、族群特征的论战。美国中东研究学界内部的论争,也是美国社会在如何处理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如何应对中东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等议题上各类分歧和讨论的缩影。

三、美国中东研究与学科理论的关系

事实描述和学术理论,哪一个更能有效指导人类实践,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元问题”。“某些社会科学家假设,我们只有努力进行经验工作,才能为合宜的社会科学理论奠定基础。而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则完全反对,声称若没有广泛的理论反思在前面引导,经验研究就一点意义也没有。”在研究价值上,“一些学者假定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比日常知识更高一等;但另一方面的学者觉得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完全根植于日常生活,并且相当依赖于日常生活,根本没有资格狂妄地自以为比日常生活还高一等。”^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中东研究,逐渐采取“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在通过事实研究验证或者修正了多个学科理论假定的同时,也通过不同学科的理论更加深入地观察和分析中东研究

① 参见 <http://www.ceousa.org/>。

② 参见 <https://www.meforum.org/campus-watch/>。

③ Seteney Shami and Marcial Godoy-Anativia, “Area Studies and the Decade after 9/11,” in Seteney Shami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eds., *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frastructure of Knowled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55.

④ [德]汉斯·约阿斯、[德]沃尔夫冈·克诺伯著,郑作彧译,《社会理论二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4页。

议题。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中东研究学界,既有呼吁将中东研究“分门别类”甚至完全取消的观点,也有要求突出“中东例外论”,继续加强对中东地区具体案例和事实研究的呼声。在一些批评者看来,美国中东专家们通常只关注领导人、决策者、主要精英的思想和经历,将某些群体的历史理解为“阿拉伯的思想”“伊斯兰的思想”,让研究陷入无序的混沌之中。与之相对,中东研究者则认为,仅关注宏观经济、社会、贸易等问题、忽视中东社会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性,并不能深入了解中东的复杂性。不能充分解读地区复杂性的前提下,贸然套用相关学科基于其他案例形成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难免导致对中东的误判。

晚近,美国中东研究与理论研究已逐渐相互结合,相互交织,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

首先,伴随着研究对象的多样化,美国中东研究走向了必然的“学科化”。作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一个门类,美国中东研究大体上可以被归为“事实性研究”的范畴。研究目的在于分析历史和现实事件,梳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情景,进而为深刻认知中东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早期的美国中东学者希望将中东研究建设成为“综合历史、语言和宗教分析的单一学科门类”。^①美国传统的中东研究往往关注历史分析和文本分析,要求研究人员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扎实的语言能力,根据不同的研究议题展开相关研究。

冷战开始后,美国与中东国家交流增多,美国对中东研究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历史和文学等传统领域,而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社会观念、族群变迁等新议题。依靠单独的历史研究、考古发掘、语言学习、文本分析研究等传统方法的路径难以满足研究需求。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行为主义”浪潮的兴起,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纷纷通过新的研究视角关注中东问题。当时的美国中东研究学者面临着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化”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东研究经历了从“东方学”到“新东方学”的转变。

^① Toru Onozawa, “Formation of American Regional Policy for the Middle East, 1950~1952: The Middle East Command Concept and Its Lega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9, No. 1, 2005, p. 118.

在研究对象上，“东方学”关注某一个具体的研究议题，比如中东的服饰变迁，中东王朝的继承人制度等；研究对象往往是中东的古代历史，尤其是不被学界关注到的重要历史议题。“东方学家们往往醉心于发掘被忽视的历史瞬间”^①。“新东方学”则关注近现代之后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注重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概念分析中东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趋势。1962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曼弗雷德·哈尔彭就曾提出，区域专家如果只依赖于事实描述，而缺少概念和理论创新，那么最后将会陷入无限探求未知事实的怪圈：“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了一种类似于收集邮票的事业……忽视了体系之间的关键区别，未能构建分析框架。”他认为，为了打破研究困境，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的东方问题学者只关注于过去，但是东方地区却正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②

其次，美国中东研究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拓展研究成果的思想深度和现实价值。美国中东研究者意识到了事实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曼弗雷德·哈尔彭就曾提出，单纯的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或是在分析方法上太过单一，或是在分析对象上“专注某一个国家，忽视了地区和社会”，因此只有具备历史、语言等能力，才能够开展中东研究。^③ 美国的中东研究也因此成为整合学科资源、推动学科融合的重要力量。“中东研究要求学者们拥有多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分析中东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促使学者们展开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④ 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著《联盟的起源》一书中的案例之一就是中东国家的战略博弈。^⑤

不同学科“理论”与中东研究“现实”成果相结合，能够帮助研究者取得更好的学术成果，使研究教学更加专业化。在现代美国高校中，并不存在专门的“中

① Manfred Halper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Field with a Few Examples,” *World Politics*, Vol. 15, No. 1, 1962, p. 116.

② Ibid., p. 111.

③ Ibid., p. 121.

④ Timothy Mitchell, “The Limits of the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1, 1991, p. 77.

⑤ [美] 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东研究”学科。因此中东研究人员必须选择学科归属,进而争取项目、发表成果和晋升职称。这一各方默认的制度安排既提升事实研究的理论深度,也增强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纽约大学的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美国中东学者,都是借助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学科开展中东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也都发表在不同学科的学术刊物上。在美国高校的中东研究中,不同学科开始悄然划分“研究地盘”。比如根据课程特征美国纽约大学的中东研究课程的任课教师会被归属不同的学科。“伊斯兰经典文献”“阿拉伯早期文献”等课程往往由语言学家讲授,“字斟句酌地研究文本内容”;近代中东研究的相关课程关注西方文化对中东的影响,以及中东国家和民族构建的过程,它们被历史学家所主导;当代中东研究的相关课程由于涉及中东社会思潮、中东政治变迁等问题,则被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所统领。^①

第三,美国的中东学者和区域国别专家,也在尝试开辟新的研究路径。美国中东学界普遍认为,中东研究和其他区域研究可以作为经验案例,验证不同学科已有的假说和概念。“区域研究可以用来验证既有普遍适用性的假设……也可以通过区域特质的分析,建立自成体系的分析系统。”^②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将普遍适用性的理论与不同区域特性相结合的“情境式社会科学”。“情境式社会科学”将普适性的理论和规律与不同国家、区域和文明案例相结合。通过国家、区域和文明的特殊性,论证既有理论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深入挖掘不同区域、国家和文明的特殊性,来修正和调整既有宏观理论的观点,进而推动新的学术探讨。^③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比较区域研究”的概念,通过不同区域研究对象的比

① Jonathan Z. Friedman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The Dual Logic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The Cas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in Seteney Shami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eds., *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frastructure of Knowled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89 ~ 224.

② Patrick Köllner and Rudra Sil,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What It Is, What It Can Do,” in Patrick Köllner, Rudra Sil and Ariel Ahrām, eds.,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and Cross-Regional Appl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

③ David Ludden, “Area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Vol. 6, No. 1, 2000, p. 8.

较,发现新的研究问题,探索新的研究方法。^①“比较区域研究致力于在传统区域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在区域内、区域间和跨区域经验研究之间,寻找平衡……比较区域研究并非仅仅受到比较研究方法的驱动,也通过分析不同区域之间的时空交错,探求理论概念之间共性与差异性。”^②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区域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或者某一类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议题,设定合适的研究路径,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比较区域研究,能够突破传统“西方中心论”的研究视角,“将发展中国家的案例重新拉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敦促研究者们关注不同区域内的多样化案例……挑战既有的关于‘区域’‘文明板块’等概念的划分标准,挑战既有的学术概念和结论。”比较区域研究促使区域研究者关注南亚、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非西方世界,“改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分工,鼓励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发展中世界。”^③

最后,过分强调学科归属和理论应用会导致国别区域研究“动力不足”的窘境。过分强调理论指导作用,会忽略事实研究的艰苦与不易。美国的中东研究和其他区域国别研究一样,逐渐成为了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的“案例”或者“反例”的集合。区域国别研究成果,逐渐沦为理论建构和理论探讨的案例库和数据库,其重要性自然较理论研究“低人一等”。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一般理论往往“忽略不同区域的特点,探寻规律和理论在不同区域的共性,而地区知识则关注地方性的事件和信息,往往被认为是为理论和规律提供注解或者修正。”^④

中东研究同拉美研究、非洲研究、亚洲研究等区域研究一样,产出的知识较为细碎,容易被理论研究的学者们视为“半个专家”或“只懂某一领域”。相比之

① 关于“比较区域研究”,参见 Ariel I. Ahram, Patrick Köllner and Rudra Sil,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and Cross-Regional Appl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Patrick Köllner, Rudra Sil and Ariel Ahram,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What It Is, What It Can Do,” in Ariel Ahram, Patrick Köllner, Rudra Sil, eds.,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and Cross-Regional Appl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

③ Sil Rudra and Ariel I. Ahram,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the Global South,” *Vestnik Rud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0, No. 2, 2020, p. 279.

④ John Lie, “Asian Studies/ Global Studies: Transcending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ross-Currents: 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al Review*, No. 2, 2012, p. 4.

下,发展日益成熟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等学科更加倾向于构建宏观的分析方法和学术概念。“研究美国政治学的学者认为自己在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并将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者贬斥为只具有一般性和地区性知识。”^①在研究内容上,鉴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非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个案相较于西方历史的重要性低的偏见,因此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地区和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学者容易“自我边缘化”,也容易被贬斥为“特例专家”。“一些区域专家可能关注某个区域的语言、文学、艺术、或者历史,也有一些区域专家参与社会科学如政治科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和其他经济学分支的讨论,还有一些区域研究者,专注于文化研究,关注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一些新型研究领域如性别研究、影视研究、族群关系等。”^②

同其他国别区域研究者一样,相较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性理论研究,中东研究的相关成果耗费心血大,且学术成果不具备广泛的适用性。“区域研究要求大量的人力投入,研究者不仅要接受专门训练,而且必须在对象国生活一段时间,并建立一个人际网络,以便使自己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更新知识”。^③由于研究议题较为具体,研究者在学术界不易获得广泛关注,往往“出力不讨好”。“社会科学当然更愿意成为一种严格的、经验的、探究人类行为普遍规律的科学。事实上,真正对政策有用的研究,大多数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并与文化联系在一起,是不具备普遍性的……人们所欠缺的是对外国社会运作的奥妙和细微差异的深入了解,而这种了解可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政治行为者的行为——无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④

① 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 A Useful Controvers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97, p. 167.

② Patrick Köllner and Rudra Sil,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What It Is, What It Can Do”, in Patrick Köllner, Rudra Sil and Ariel Ahram, eds.,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and Cross-Regional Applic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

③ [美] 弗朗西斯·福山:“学术界何以有负于国家:区域研究的衰落”,《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91页。

④ 同上。

四、结 语

纵观美国的中东研究发展历程,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美国的中东研究的成功之处,一方面在于其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宗旨。各方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研究导向,带动了对中东地区文化、历史、宗教、民族和政治等领域一大批优秀学术成果的出炉,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学术体系和平台。另一方面,政府、高校和社会紧密合作。美国政府牵头组织规划,提供政策和法律保障,并在财政上予以倾斜。再由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向指定机构和人员提供充足的项目资助。大学作为执行者,负责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是知识产品的直接来源。各学术社团则在其中扮演着润滑剂和黏合剂的角色。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紧密联系,为其后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学术界,各专业学者通力合作,利用跨学科方法针对具体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考察的做法,同样有助于打造更为科学、全面的知识体系。

不过就其本质而言,美国的中东研究仍然是为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背书的知识及话语生产工具。因此作为中国的中东研究者,我们必须对中东地区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间在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给予充分的了解与尊重,在思想层面上开拓一种新的、更为平等的全球磋商与协作的知识和话语共识机制。“我们并不是在研究某一个区域,我们只不过在研究一个区域发生的事务。很多的议题——权力、国家、贫困、家庭、生活、玩笑、腐败等,都具有广泛的共通性……我们只不过是研究某一种特定的表达而已。”^①中东研究和其他国别和区域研究,自身即带有“反西方中心论”“反霸权主义”的话语色彩。“区域研究揭露了历史、语言、权力结构等特定的乃至理想化的‘西方论述’……对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以及苏联地区的研究,不断挑战‘美国中心论’

^① Seteney Shami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frastructure of Knowled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438.

和‘欧洲中心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霸权。”^①

同时应当看到的是,美国中东研究和其他国别区域研究一样,也面临着研究动力不足的问题。美国现有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研究者注意到,“冷战后期以来,对于区域研究的关注逐渐减少,学界的关注对象从民族国家和地区内部事务,转变为关注宏观的全球事务。很多观点质疑区域研究能否揭示全球社会经济趋势,以及日渐受到侵蚀的国家间边界。”^②过于强调理论的做法使得事实研究的动力不足。在“硬科学”看来,区域研究所提供的事实,应当被纳入已有的理论框架中。一些学者甚至自信满满地认为,如果国别区域研究的结果与学科理论相悖,那么需要反思的就是国别和区域研究者,而非理论研究者。他们认为“如今我们站在比以往更加有利的哲学位置之上来观察和评估区域研究同政治科学之间的讨论。那些坚持区域研究有其特殊性,能够提供‘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观点,都应当遭到广泛质疑。”^③

中国的中东研究是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别区域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正名,既受益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对域外知识需求推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理应与西方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理念和实践有所区别。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根据议题的特点,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多领域、多机构的研究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④在此背景下,借助交叉学科契机,建设中国特色国别区域研究的新学科,既是满足中国对外交流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

① David L. Szanton,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2.

② Seteney Shami and Marcial Godoy-Anatvia, “Area Studies and the Decade after 9/11,” in Seteney Shami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eds., *Middle East Studi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Infrastructure of Knowledg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64.

③ Ian Lustick, “The Disciplines of Political Science: Studying the Culture of Rational Choice as a Case in Point,” *Political Science*, Vol. 30, No. 2, 1997, p. 176.

④ 王晋:《议题与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第107页。